

# 用电影展现优秀共产党员的风采

王兴东

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：“江山就是人民、人民就是江山，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。”连日来，我反复领悟这句话。电影是心灵的工程，艺术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，让银幕上的党员形象感动人心、激励人心，让银幕成为党与人民的连心桥，是我写剧本的初衷。

## 雷锋精神“回家”了

1973年我在部队入党，雷锋是我们沈阳军区学习的模范。雷锋是怎样牺牲的？一个谜题曾长期萦绕我心。直到1995年的一天，我从报纸消息上发现了一个叫乔安山的人。多次前往辽宁铁岭，采访雷锋生前的战友乔安山、庞春学、于泉洋、田生绵之后，我写成了电影剧本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。

乔安山说，在认识雷锋以前，他“长到那么大个子，就昏昏地活着”。18岁那年，雷锋走进了他的生命，也影响了他的一生。雷锋离世之后，乔安山一直默默无闻做好事，送迷路孩子回家，照顾孤寡老人，献血、捐款、劝架、救火、抓小偷……这是一种信仰和追随。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用4个小故事完成了雷锋精神没有离开我们的讲述。看完样片，泪流满面的乔安山握着我的手说：“你们让班长的精神‘回家’了！”

影片公映后，57岁的乔安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雷锋精神与观众心灵产生了强烈共振，北京有185万人走进了影院。北京地质礼堂经理陈淑萍告诉我，整整一个月，她每天租用5辆大客车去学校运送学生往返影院看电影。如今20多年过去，很多当年的学生已成为家长，又引导着自己的孩子看这部学雷锋做好事的电影。

孔繁森从山东聊城黄河平原调到西藏海拔4500米的阿里高原工作，这位厅级干部背着药箱，给藏区牧民送医送药，自己经济不富裕还收养了两名藏族孤儿。写《孔繁森》剧本时，我访问了多位孔繁森的亲人。他的儿子孔杰告诉我，给父亲收拾遗物时，没有一个存折，兜里只有8元6角钱，有一个大箱子，里边装满藏民送给他的上千条哈达。电影中展现的无数条哈达，就是他连接藏族同胞心灵的纽带。

写电影《生死牛玉儒》，在呼和浩特采访时，一位市民对我说：“我们评价干部就一把尺子，看他是否为自己捞好处，还是为百姓谋利益。就凭牛书记给我们退休人员每月涨100元工资，你也得写这部电影。”写共产党人的故事，需要紧紧抓住“党群关系”做文章。牛玉儒身患癌症，却关心着牧民饲养的奶牛，他知道奶牛患病会影响产奶量，少产一吨奶，牧民就少收入1700多元……这些在生活中发掘的真实细节，生动展示共产党人置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的党性。

## “一支蜡烛两头点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”

蒋筑英43岁病逝在检测太空望远镜的科研岗位上，是被追认为党员的中年科学家。创作电影《蒋筑英》剧本，我采访了60多人，特别是两次采访他的导师王大珩。这位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获得者、我国近代光学工程的重要学术奠基人、开拓者和组织领导者，为中国在



展时代画卷 谱奋斗华章

图①：电影《离开雷锋的日子》剧照。

图②：电影《邹碧华》剧照。

图③：电影《许海峰的枪》剧照。

制图：蔡华伟

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奋斗了一生。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：“只有当‘我为人人大于人为我’，这个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。”王大珩的理想，深刻影响着蒋筑英。为了让中国光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，蒋筑英鞠躬尽瘁。他说：“我要一支蜡烛两头点，燃烧自己，照亮别人。”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我们在陌生领域从无到有进行探索，在高端技术空白地带白手起家，向着遥远太空一次次进发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？因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像王大珩、蒋筑英

那样爱党爱国的科学家。我怀着惋惜之情、流着泪写完这个剧本。

我还写过电影《许海峰的枪》。为什么取这个片名？1984年7月29日，第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，许海峰在与各国强手竞射中拿下第一枚金牌，实现中国奥运史上零的突破。这枚金牌意义重大，它抒发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敢于参与国际竞争的自信。但很多人并不了解，许海峰是从安徽省和县新桥供销社一个卖化肥的供销员，逐渐成长为一名奥运冠

军。置身他当年工作的仓库里，我仿佛看到他百折不挠、苦练枪法、咬住目标、坚守理想，一步步走向奥运最高奖台。我意识到，许海峰的故事代表了中国奥运健儿敢于拼搏的精神，也将鼓舞亿万中华儿女的心。

## 他们是群众的知心人

守住人民的心，还要讲好共产党取信于民的故事。在上海山阴路145弄，我曾听曾联松讲述在阁楼上设计国旗的往事。1949年7月，《征求国旗、国徽图案及国歌歌谱的启事》发出，曾联松决意参与投稿。有人劝他：“共产党打下的江山，一国之旗怎么会让你来设计？”32岁的上海市民曾联松不相信，他把设计好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寄往北京。在2929幅图案中，曾联松的设计方案经过人民政协会议民主协商投票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。电影《共和国之旗》讲述的就是一个平凡人和一面国旗的故事。

电影《建国大业》是我担任多年全国政协委员有感而发的创作，依据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的“五一口号”。我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旧址，强烈感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共领导人的政治魄力和伟大胸怀。《建国大业》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片上映，激发全民爱国热情。

守住人民的心，就是要展现党的根基在人民，血脉在人民，力量在人民。被誉为“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、敢于担当的好干部”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邹碧华，47岁时突发心脏病，殉职在司法改革的工作中。他的事迹很快传开，最高法影视中心邀请我参与剧本创作。我认为，要到生活中找到人物的精神支点。在邹碧华的出生地江西省奉新县下塘村，乡亲告诉我，他7岁时还不会说话，带他长大的外婆是个哑巴，他后来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。在奉新县中学，我找到他的班主任老师，80岁的老师讲起邹碧华邀请他到上海去治病，竖起大拇指夸奖说：“邹碧华是有良心的人。”这位普通人家出身的法官，始终保持与人民的情感，所以他才能不怕麻烦，解决处理群众多年上访的案件，率先提出《法官尊重律师十条意见》，赢得民心。特别是他主持起草了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》，为全国司法改革先行试点工作。改革方案遇到阻力和压力时，邹碧华带着起草小组参观中共一大会址。站在一大会议址前，我感悟到，这位“改革先锋”的精神支柱来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。邹碧华逝世后，有4万余人在网络上献花点蜡，3000余人自发参加他的遗体告别，这是人民群众对一位优秀共产党员的由衷不舍。

我用电影致敬我们亲爱的同志，怀着崇敬的心情深入生活，探访他们崇高精神的动力源泉。我被他们的心灵感动着，也努力用银幕作品塑造他们的艺术形象，传递他们的精神力量。共产党员都有鲜明的个性，但他们都为人民群众幸福、为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，他们乐于吃苦在前、享受在后，他们的形象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。雷锋、乔安山、蒋筑英、王大珩、孔繁森、牛玉儒、尚秀云、雷经天、许海峰、曾联松、邹碧华等，这些我写过的优秀共产党员，他们是群众的知心人，发挥了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。

（作者为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长）

# 电影《三湾改编》的艺术创新

李云雷



并不仅仅关注枪战，而是将其组织进叙事之中——攻打长沙及其失败，成为影片故事的起点。影片结尾井冈山飘扬的红旗，则象征着中国革命翻开了新的一页。

影片采用了多种手段，力图细致刻画历史人物。毛泽东作为“三湾改编”的主导者，在影

片中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刻画。侯京健的演绎，英姿飒爽，形神兼备，既有知识分子的风采，又与士兵、农民打成一片，让我们看到了人民领袖青年时的神采。影片还讲述了王尔琢追回逃兵、伍中豪为宋任穷改名等精彩故事，通过细节表现了红军将领的性格与风采。此外，影片

还对余洒度、苏先骏等人物做了实事求是的表现，他们是红军的师长、团长，但身上仍保留着旧式军队的作风——官兵不平等、军民不一致，这正是“三湾改编”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。影片通过揭示不同层次的矛盾，从整体上还原了历史，让我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“党指挥枪”“支部建在连上”“官兵平等”等的来之不易。

片尾长达数分钟的长镜头，完整再现“三湾改编”的全景，连绵无尽的山峦，随风飘扬的红旗，共同构成了这部电影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。影片片尾，以“老照片”的方式呈现了主要人物的人生结局，这既是对革命先烈与开国元勋的致敬，也拓展了叙事时空，为观众留下了更多思索的空间。

电影《三湾改编》融叙述和抒情于一体，在艺术上也努力创新，既是“传承红色基因、赓续红色血脉”的艺术呈现，也努力为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探索新路。

图为电影《三湾改编》还原的三湾村。

7月，上海电影制片厂老导演赵焕章迎来91岁的生日。他为中国电影留下多部经典之作，特别是农村题材电影，至今为人们津津乐道。

在第三十三届中国金鸡奖颁奖礼上，赵焕章与丁荫楠、金迪两位前辈一道，获颁“中国文联终身成就电影艺术家荣誉表彰”。到了“鲐背之年”的赵焕章，耳背，腿脚不听使唤，坐着轮椅接受颁奖。老人家一身喜洋洋的大红外套，正脸对着镜头，中气十足地发表获奖感言。还是那一口带点山东腔的普通话，一板一眼，掷地有声，好像又回到30多年前，他和他的影片《喜盈门》《咱们的牛百岁》《咱们的退伍兵》红遍大江南北的日子。

按照中国电影导演谱系，赵焕章属于“第四代”导演，与吴贻弓、丁荫楠、吴天明、谢飞同辈。绝大多数“第四代”导演都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才正式开始拍片，而赵焕章在片场摸爬滚打的时间早了整整20年。

在上海电影界，赵焕章属于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入行的一批电影人。进电影界前，他是鲁豫皖老解放区的一名文艺战士，在山东大学接受艺术启蒙，在部队文工团排演过话剧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他们随军南下，进驻上海，被分配到刚刚组建不久的上海电影制片厂。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与上海电影人，彼此取长补短，互帮互学，共同进步。赵焕章这一路人马，大约有四五十人，同行的还有仲星火、汤化达、铁牛等一批后来为观众所熟悉的老影人。那时候他们年轻，一身粗布戎装，皮肤黝黑，浑身散发着沂蒙山淳朴的泥土气息。汤晓丹导演后来有个说法，他们的到来是“给咖啡加点糖”，上海影坛因此有了不一样的味道。

进入上影厂，赵焕章的人生迎来一次重大转型。像他这样的老区文艺战士，对电影这种现代工业产品原本知之不多。好在进厂以后，遇上了一批经验丰富、古道热肠的电影前辈来为他们架桥铺路。像沈浮、汤晓丹、桑弧、徐韬、鲁韧等，这些大名鼎鼎的老导演，先后都在片场当过赵焕章的师傅。赵焕章从场记、助理、副导演开始做起，一步一个脚印，最终成长为独当一面的电影导演。从1952年进厂算起，到1980年晋升导演，赵焕章花了整整28年。那一年，他50岁了，才刚刚把导演前面的那个“副”字去掉。这样的人生履历，在今天看来都有点不可思议。可恰恰是这一漫长而扎实的人生历练，才赋予了赵焕章不鸣则已、一鸣惊人的底气和功力。

赵焕章的成名作并不是人们熟悉的“农村三部曲”，而是1980年的《海之恋》。今天知道这部片子的人大概不多了，可我依然记得，当年看完《海之恋》之后的心潮澎湃。夕阳西下，大海泛着炫目的波光，把人带入了一个金灿灿的美丽新世界。赵焕章更像是一位用镜头作画的浪漫画家，他用一幅诗意喷薄的画卷，向人们宣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。

真正让赵焕章攀上创作巅峰的，是1981年6月上映的农村题材轻喜剧《喜盈门》。当时，电影发行按拷贝数和观众人次计算。《喜盈门》创下的纪录，是发行拷贝4000多个，城乡观众5亿多人次。

《喜盈门》在40年前凭啥这么火？答案不只在电影，更在于那时候刚刚起步的历史大变革。《喜盈门》是一部家庭伦理剧，讲北方农村一个四世同堂大家庭，祖孙婆媳姑嫂妯娌之间的人际关系纠葛。最早的农村改革，推行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。这种机制，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目的，让各家各户的实际劳动力数量，成为生产规模和收入来源的决定因素。《喜盈门》锁定的这一主题，并非农村体制改革本身，而是由此引发的家庭伦理话题。这样一来，一个复杂难缠的问题，就被转换成了浅显易懂的家庭亲情关系描绘，让观众透过伦理亲情的重建来感知改革开放带来的时代脉动。假如没有对乡村生活的透彻体认与切身感悟，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不可能的。赵焕章扎实、厚重的生活和艺术积累，成全了他。

《喜盈门》里有个细节，大媳妇强英趁爷爷外出给孩子们煮饺子吃，可巧，爷爷又折了回来。强英把饺子藏了起来，可桌下掉了一个，强英怕爷爷看见，就用脚狠狠踩住，把饺子碾了个稀巴烂。她宁肯把饺子踩烂，也不肯给爷爷吃。强英这一脚下去，让我记恨了许久。用这样的细节塑造人物性格，绝非一般的艺术表现，它并非来自艺术本身，而是现实生活的赐予。

《咱们的牛百岁》有一场戏，懒汉田福跑到牛百岁家里去泄愤砸锅。谢晋导演对这场戏赞不绝口，说这种戏谁都拍不过赵焕章。没几十年的农村生活，绝拍不出这样朴实无华又精彩绝伦的场面。

这个经验，经过赵焕章的提炼总结，就成了他践行终生的创作箴言：“要拍农民戏，先拜农民师。”

（作者为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）

